

葛大汇 著

上海市

教育学术图书

出版基金



升学考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对“应试教育”的剖析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升学考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对“应试教育”的剖析

葛大汇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升学考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对“应试考试”的剖析/葛大汇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7
ISBN 7-5617-2577-9

I. 升… II. 葛… III. 入学考试—考试制度—教育改革—研究—中国 IV. G4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590 号

升学考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著 者 葛大汇
责任编辑 刘国良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封面设计 高山
版式设计 蒋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9.25
字 数 258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一次
印 数 6000
书 号 ISBN 7-5617-2577-9 / G·1023
定 价 13.00 元(平装)
18.00 元(精装)

出 版 人 朱杰人

上海市教育学术图书出版基金
资 助 单 位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地图学社

序

在相当程度上普及教育的今天,尤其是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可曾想过,升学考试对人类的影响有多大。回想起来,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场考试”的情景中,无论是顺利,还是困苦,考试实在是对每个人最为严峻的考验。人力资本的理论指出,受教育对一个人的生涯福利有着很高的贡献率,对弱势人群的贡献更大。东方儒学文化早已有“应试教育”之说,其实西方也不例外,比如法国在拿破仑建制之后称“考试的故乡”,日本人自称是“考试地狱”,只是或许程度不同,不那么凝重罢了。在国家发展方面,因为教育是国民素质的保障,是人才的竞争,因此选拔人才的升学考试也就是学校的“指挥棒”(这个词不见得是贬义词),它表现国家的意志,维护着国家在智力上的安全。

在书中我曾借学者之言说过,“考试是判官”,是个人与社会或市场交换的证书,并且也应该是调整和刺激教育资源适应社会发展的“调节器”。这是历史赋予考试在“这个”生产力水平上的社会职能。但是,本研究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的基本立场是站在人的或“受教育者”的這一头的:大多数人认为教育不能成为考试的附庸。应试教育的的确确扭曲着人性!

我们曾经做过不少“考试本身”的研究,编制测验,考察现有高考、中考的预测效度,写批评性的文章。现在看来,这是在做“僧多粥少”的事情,招生数额本来是固定的、有限的,即使编制了信度、效度再高的考试,还是面对那么多考生,这又有什么用呢?而在考试制度上,我们一方面要在极其有限的招生计划数中,用“多种”、“多次”考试来进行分流选拔,用“公开、公平、公正”的分数来抑制人们的“大学、高中梦”;另一方面,又要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模糊淡化”考试的筛选意义,实在是一个滑稽的逻辑。升学考试的问题,主要不是科目设置、试卷编制等测量学上的问题,而是教育的供需问题。这似乎

是明摆着的问题。但是,这个认识也是很难争取来的。

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考试制度尤其是在高校招生规模和中等教育的“普、职结构比例”上,存在着生源市场需求和行政意志的不同价值倾向。人们对“严格的分数控制线”的批评往往归咎为“以往计划经济的刻板”,但在今天看来,恐怕行政机构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知道,在1998年扩大招生规模之前,一些教育部门曾“过度”地担忧现有学校接纳学生的“教育能力”,对“宽进严出”一类的扩招方案提出“高学历失业”的责难;而当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当教育被认定具有产业的属性,“可以拉动经济,促进内需”之后,舆论上又表现了扩招的功劳。本研究通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等城市发展趋势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考察,通过“教育分流”的行政意志与市民迫于“学历社会”而竞争考试、竞争教育的矛盾分析,指出改革考试制度的关键是:使考试成为满足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需求的调节手段。这或许就是“考试社会化”的本质。

社会化的概念总是与“市场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指出:在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比较完善,全面实行缴费上学制度后,学校可根据社会需求的办学条件自行调整招生规模。国家通过制定学校设置及学位和学历证书的基本标准、审核办学条件、教学评估、拨款,以及通过有关部门发布毕业就业状况和人才供求信息等手段,调控招生总规模和专业结构。本书的观点是,中国特有的“读书热”、“升学应试”是中国教育发展竞争的动力,动力本身不是坏事,是好事。因此,行政“控制”不是单纯地把考试看成是分流筛选的工具;国家必须对考试进行干预,但是并不是把招生入学和就业分配统统包下来,在一定意义上,干预的策略也是市场的策略,运用社会的、市场的关系来促进教育的发展,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另外,还可见到,“社会化”或“市场化”的观点是尊重人性、尊重受教育权利的人本主义的东西,不是什么势利的、物欲的东西。

在中考“普通高中热”的应试竞争上,也是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我国很多城市“高中阶段的升学率”已经超过90%,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这个“高中阶段”中的中等职业教育即职教类“三校”的

质量令人怀疑,“三校生”缺乏就业市场,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过早地职业定向和学业分流。而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学科门类的划分,其实均可“纳入专业院校的范畴”,每一所大学既不是职校,又是职校。所以,改变中考招生的普职比,不要死盯在“普职”教育在名称上的区别,加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无疑也是一种符合国情,符合百姓文化心理的改革措施。

很多应该这么做而没有这么做的遗憾,有些是历史的必然,有些是“主持考试者”及其行政的问题。人们从来也没有怀疑过考试的地位,也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以往考试机构的权威。从招生考试当事人关系的角度看,“招收和录取学生”的事务本来是由提供教育服务的学校(其人格化就是“招生法人”)与考生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在本研究中可以看到,现行考试机构并不能代表考生价值主体的利益,又因为它越俎代庖而削弱了学校对生源市场的调节能力。如果我们承认考试是“中介”,那么主持考试的机构也应该是“中介机构”,而不是行政机构。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与我国教育从中央集权的传统到目前逐渐“放权于地方”的历史背景有直接的联系。

总之,本研究的基本对策可以说都是笼罩在“终身教育”的哲学之下的:如果说社会化考试体系是从需求与教育的结构关系方面来考虑的,那么相关的主张,学分制、证书化、宽进严出等“延展性”的考试制度,便是从时间的即终身教育的方面来考虑的。在学校招生自主与国家统一证书考试标准的基本制度下,“考试常设,考试等人去考,学分和证书可以累积”,而不是“一考定终身”,这意味着考试改革中,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教育民主意识的唤起。

本书是在对十年历史文献调查、二十余个现场会议问访、二千六百多人大样本问卷调查和对五十一名高级官员进行征询的基础上写成的,由于研究的经费有限,所用的案例主要是上海市的,一方面也是因为上海具备经济发达城市的主要特征,考试改革与研究活跃。特别感谢在本研究“官员征询函”中各位领导的支持,感谢文献调查中所引用的各位学者的意见。



葛大汇,男,1952年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师,副教授,教育管理系评价与测量教研室主任。曾参与或主持了教育部和地方教育部门多项研究课题。其中“语言-表达学能的结构与测量”研究于1998年获教育部办公厅“全国师范院校基础教育改革实验优秀成果”二等奖,“人格教育模式”研究获上海市第六届“教育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等,著有专著《人格教育-走向21世纪》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年,《为了学生发展的教育》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衡山夜话-教育问题的对话》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基础教育校内课程改进之探索》香港教育研究学会文集‘14,1997年,《学能组合测验-语言与阅读》,《教育评价涵义的多元性及其他》,《作文学习中情感因素与测量》,《教育者-面对儿童重负的责任》等专著与论文。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发达地区升学考试问题调查与对策研究综述	1
第一节 对本课题大规模调查与研究的说明	1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结构	2
二、问卷、征询函的编制与被试	4
第二节 各种研究方式中的主要论题便览	6
第三节 若干研究范畴:升学考试的问题与对策	14
一、扩大高教规模,适应考试生源市场和社会的教育需求	14
二、调整高中阶段“普职比例”结构,减缓中考竞争	18
三、“考试调节器”——对有限教育资源的考试管理	31
四、推行考试社会化,把应试压力“还给”社会	37
五、放权于地方,制定符合地方发展的升学考试法规	43
六、招生法人与考试当事人——考试主持机构的改革	51
七、实行证书与学能考试,扭转机械沉重的应试教育	56
第二章 升学考试改革历史的价值论研究	67
第一节 生源市场与招生法人	67
一、普通高中—高等教育:供小于求	67
二、“缴费收费”应该建立的市场关系	68
三、招生计划滞后于上海可能承担的教育能力	69
四、考试机构越俎代庖,减损了学校对市场的调节能力	73
第二节 分配计划与教育分流	74
一、招生总量也是控制就业市场的分配计划	74
二、分配计划:高校能不能扩大规模,高中阶段已经饱和,主要是普职比的问题	76
三、对教育分配或教育分流计划依据的分析	80

四、筛选、公平、效率、补偿:已被揭示出来的对立概念·····	86
第三节 价值规范与地方立法·····	90
一、考试系统与教育价值——人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	90
二、历史回顾:考试改革及其价值实现的背景分析·····	91
三、统一、分权、社会化、延展性:对立而联系着的主张·····	101
四、当事人、市场、教育行政:考试关系中的价值主体·····	108
五、规范——考试改革中限制与需求的统一·····	113
六、地方立法及其对上海改革发展的意义·····	117
第四节 考试编制与考试机构·····	128
一、选拔考试、水平考试及其难度·····	128
二、科目组成的代表性与考生负担·····	133
三、针对“一考定终身”的“多次”机会·····	140
四、关于考试机构法律地位的改革(略)·····	147
第三章 当前重大专题会议与专家问访调查·····	148
第一节 升学考试面临的问题·····	148
一、“缴费”投资刺激下的初中后升学考试竞争·····	148
二、考试体系自身的改革不能增加失败者的机会·····	151
三、会考是后继升学考试的一连串机械预演·····	153
四、教育行政部门已经习惯用会考监控下属学校·····	155
五、“水平”会考不可避免地是“选拔”高考的重复·····	157
六、会考中的“考完一门扔一门”的厌学现象·····	159
第二节 改革试验中的问题·····	161
一、改革中的只求在行政上“可以操作”的态度·····	162
二、高考中增加考试机会与加重应试负担的矛盾·····	163
三、中考中“两考分离”很难说是“双向选择”·····	166
四、一些大学对以往“招生自主”的主张渐渐淡漠·····	170
五、区县要求中考招生与录取自主以切合地区的需求·····	173
第三节 “同步的”背景问题·····	175
一、人口分析中不容轻视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	175
二、学历就业——考试竞争——提供成功证书·····	178

三、考试改革对实现国民素质教育具有重大影响	180
四、扩大普通高中招生比例是考试改革的结构性措施	181
五、“宽进严出”与考试主持者、办学竞争等变革	184
第四节 “超前的”或“先行的”问题	186
一、与“终身教育”相匹配的证书考试制度	186
二、招生法人、命题权、监督、学校声誉等等社会化	189
三、初中后高中——免试直升大专的“社区学院”制	192
四、基础教育之后高等教育之前的“预科”与选择	195
 第四章 社会公众(家长)与教师意见报告	199
第一节 问题的来源与问卷编制的结构	199
第二节 调查对象分类、分层的抽样设计	200
第三节 对各类问题的看法与分歧的统计分析	201
一、第一选择是普通高中,第二选择还是普通高中	201
二、家长、教师及专家赞同“普及大学大专教育”	204
三、公众投资首选“供孩子继续受非义务阶段教育”	206
四、发达地区“普通高中是今后发展的文化基础”	208
五、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结构比值的意见	212
六、“高中连着大专的五、六年学制”式的全日制高等教育	214
七、考试的“机会或次数”是“同一种考试准许再考”	215
八、中考要求“两考合一”,高考要求“两考分离”	217
九、难分“水平考”“选拔考”,取消高中会考	219
十、考生独立“考试社会化”,考试为“分科组合证书制”	221
十一、公众赞成“升学考试实行宽进严出”	223
十二、教师与专家倾向“采用多元评价资料录取考生”	225
第四节 本次大规模问卷调查的简要结论	227
 第五章 行政官员与专家意见征询函分析	229
第一节 《官员与专家意见征询函》的编制与结构	229
第二节 调查对象分类、分层的抽样设计	230

第三节 对各类问题意见简要统计的整理·····	230
一、升学考试联系着“教育与社会或市场交换”的系统·····	230
二、“上海教育先行”:扩大高教规模,改动中等后学制·····	232
三、地方立法或“教育特区”:高学历教育扩容,促进经济·····	238
四、考生社会化,考试机构社会化与“国家职能”·····	242
五、利用参考信息证明考生水平和性向的“组合证书考试”·····	246
第四节 本征询函调查研究方式的特点·····	248
第六章 学能组合考试(ACT 模式)的编制与实测 ·····	250
第一节 学能组合考试研究的主要内容·····	250
第二节 本研究中的学能因素与结构·····	251
一、学能及其在测验编制中的设计原则·····	251
二、教学论研究和测验出版物中的能力因素·····	254
三、项目重要性程度的调查与分析·····	256
四、本测验通过实测分析建立的学能结构·····	258
第三节 《阅读》、《语言与表达》考试编制·····	261
一、本测验命题的双向细目表·····	261
二、“全域式学科”的测题材料与新情景·····	264
三、低词频文言文测题材料的作用·····	265
四、题型与命题思路举例·····	265
五、本测验的试卷组成·····	268
第四节 上海地区学生考试实测的分析·····	269
一、本测验的结构效度·····	269
二、本测验的准则关联效度·····	273
三、本测验的内在一致性信度·····	275
四、本测验结果的特征量分析·····	275
五、本测验测题的难度和区分度·····	277
第五节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主要结论·····	280
附:鉴定材料 ·····	283

第一章 发达地区升学考试问题调查 与对策研究综述^①

本章是在对十年历史文献调查、二十余个现场会议访问、二千六百多人大样本问卷调查和对五十一名高级官员进行征询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剖析应试教育、改革考试的决策有作用。

第一节 对本课题大规模调查与研究的说明

本研究是一个三至五年的立项课题,然而升学考试问题不允许不允许研究三五年?因为考试政策的变化太大了,研究需要有“时效性”,没等你研究完,政策已经变了,那么还用研究吗?这是个假问题,是个古怪的问题。或许正因为“政策变化太快”——问题重要,问题需要随时调整,问题跟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与中国千家万户的生活与幸福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才要坐下来,认真而执着地花大力气,花长时间去研究它,而不是“拍拍脑袋一蹴而就”。在很多情况下,迅速的决策正是以长时间研究的积累为基础的,要么就是我们在本书中提到的那种“轻视法律、只知道下行政命令、而又时时出尔反尔、必须收收放放”的状态。

当然,在长时间的研究中同时要注意“时效性”是对的。除了下文将说明的“本课题的研究方式与结构”之外,我们在直接的效用上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课题组十分欣慰地看到,几年来,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的改革思想和对策建议,通过会议发布和报刊媒体

^① 本研究课题组人员:金一鸣、葛大汇、唐安国、雷秀峰、苏忱、君后庆、夏秀蓉、郭开平、刘昌堃。

的传播,其中的很多内容(例如“宽进严出”、“高教扩招”等),或者已经被全国各省市的考试改革中雨后春笋般的试验或实施方案所证实;或者已经被本课题组所在地——上海市的教育行政部门所采用。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结构

1996年,我国教育领域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以及更早的体制改革等政策的指引下实施了多方面的改革,但是仍然存在着系统性的问题。在教育管理体制方面,办学权力仍过于集中、过于划一,学校几乎没有自主权;在教育结构方面,高等教育规模过小,成为“瓶颈”,高中阶段的普职比例刚性过强,不适应社会发展和公民的需要,等等。考试问题自然也是众多问题中人们议论和关注更多的一个议题,因为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考试制度的国家,老百姓十分重视考试,各种类型的考试不仅被人们看作是就业、升迁的凭证,甚至被认为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关隘”。

课题组抓住考试这个问题申请立项,是因为我们认为考试的改革将牵一发而动全局,它既与教育管理体制有关(由谁来主考、考什么),也与调整教育结构相连(哪些人可以参加哪种考试),同时,又与整个教育的改革氛围紧密相连。课题组的成员大多是考试与测量方面的专家、教师,在这个领域曾在教育部考试中心立项,完成了高考的“学能测量”(七五课题)和“组合考试”(八五课题)的研究。但这一次课题没有在考试编制上大作文章,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考试的社会问题上,即与考试有关的人们对考试的认识、对考试的要求、考试如何与社会大发展协调以及与教育改革相适应等系统性问题上。

之所以这样做,课题组认为,改变中国的考试制度仅就考试谈考试是难以奏效的,必须从更宽泛的范围、多侧面地提出改革的思路。从某一种意义上说,“为什么要改革”比“如何改革”来得更重要。同时,课题组的成员也多次受到教育部考试中心官员的鼓励,他们希望华东师范大学以及上海的研究者能对“我国升学考试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作出贡献。在此,我们感谢在本研究“官员征询函”中受到教育部有关司和教育部考试中心如此详实的“书面意见”和感情上的支持。

本课题在研究结构或称为“思路”上,是简捷的、追求扎实的:它是由历史文献调查、现场专家咨询、大样本公众调查和高级官员征询,这么四种调查方式对同一个系统问题的研究。显然,这些“方式”既考虑了当事人价值主体的维度,又顾及了研究方法上“纵深”的即怎么产生问题和谁能解答该问题的维度。文献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梳理我国教育考试尤其是上海升学考试(高考、中考)近二十年来的改革脉络,了解考试改革与时代背景变化的关系。专题会议和专家访谈,则是为了使研究更有针对性,吃准当前改革的若干目标和将会遇到的主要障碍,并逐步分析一些改革主张或对策与当前社会现实的关系。近四年来我们大约组织了20场会议访谈。在历史回顾和现场调查的基础之上,我们分别要求广大公众和高级干部作出回答。因此,本研究的问卷调查追求的是“大样本的”,尽管这与项目的太少的经费资助是不相称的,但这或许就是华东师大的“严谨”之处。而在官员征询调查中,我们要的是“官大”,我们相信这些意见具有现实的和潜在的行政权威的含义,值得我们去批评或接纳。

在本研究内容的结构方面,大致可以分成“理论系统研究”和“对策研究”两个侧面。

系统的研究从考生生源市场的调查出发,分析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与社会各种需求及投资体制的关系,希望对上海高学历教育和普、职两类教育的发展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它联系着这些问题:社会经济——上海城市功能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增长方式从劳动力密集型趋向高新科技集约化,并已经形成巨大劳动力流通市场的背景下,高考、中考所竞争的学历教育的供求关系是怎样的。地方法律——地方发展与国家规划之间的差异,尤其在“有偿高学历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等具有多重特性的问题上,通过地方立法,实行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也为适合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考试发展寻找根本的依据。伦理——教育分流即教育筛选中所体现的行政意志,与市民在“学历社会”中选择考试、选择学校、选择教育权利之间的矛盾,如何通过制定“提供成功机会”的考试政策而得以化解。教育市场——它与上述道德问题构成效益与公平的关系;与上述全局发展的问题构成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其核心是能否使考试制

度成为满足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需求的调节手段。考试机构——考试机构的性质将“固定”上述所有价值关系和升学考试中所有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和权限。

对策的研究从来也不会离开系统的研究,这个侧面主要是想表现“时效性”,它是通过本课题组“本来就有几位上海市教委行政官员作为课题成员”这么一种特别的组织构成而实现的。课题组华东师大的成员曾被邀请同时参加了上海市考试院主持的“高考—会考制度改革”研究、参加了教委主持的上海市卢湾区等四个区县的中考改革研究,等等。也就是说,本研究的所有研究成果,差不多是在“第一时间”内指导着或影响着上海的升学考试改革的。我们曾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年解决或减缓一组问题,三年造成一个成熟的制度体系”。此外,在比较研究中,课题组调用了以往经验中对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和英国证书考试等研究成果。

二、问卷、征询函的编制与被试

“家长教师问卷调查”和“官员征询函”的研究方式具有统计学的意义,因此必须在此交代其问题的构成和被试抽样的情况。

首先是家长教师问卷:如上所述,问卷的问题是从历史回顾和“现场”会议问访及专家咨询这么两个维度得来的。问题有诸如“一考定终身”这样的一般舆论性的问题,也有一些较为“专业化”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将家长与教师分开,分成两大样本,各出一份卷。其中既有相同的问题,也有不同的问题。相同的问题是为了扩大调查的样本容量,并且能作两类样本比较;不同的问题是为了使问卷更有针对性。

《家长公众意见的征询问卷》、《教师与专家意见的征询问卷》两种问卷,家长卷由 13 个问题组成,教师卷由 16 个问题组成。两类问卷都含有:对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及就业或升学市场的认识、生源市场调查、求学竞考的原因、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态度、对“普职教育结构比例”的愿望、考试次数或品种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家长卷另有:教育消费或投资的比重、报考志愿的顺序、“以钱买(补)考分”等专门问题。教师卷另有:初中后教育的学制、高中分流、高考与会考的关

系、能力及证书考试、考试社会化等问题。

本调查希望能典型地表现出大样本的被试分布及其意见倾向。为此,我们设计了尽可能全面、多层次的抽样变元:第一是学校类型和层次的差异。第二是地域文化的差异,例如城区市民与郊县农民或居民的教育需求是不同的,这在上海还有“上只角”、“下只角”一说。第三是群众与行政干部的眼界的不同。第四是被调查者个体的职业类别和文化程度的不同。在回收问卷各子样本数据的实际分析中,除第四种变元的分类没有显著差异即没有统计意义外,其他变元的设计对解释样本数据是有效的。

本调查两类问卷共发放 3000 份,回收后剔除因填写不规范等废卷之外,有效样本容量为 2647 份,即净回收率为 88%。其中:家长问卷的子样本容量为 1405 份;教师问卷的子样本容量为 1242 份。

其次是官员征询函:按原课题方案的研究进程计划,本函编制于 1998 年年底。在前期三种方式的调查之后,为了区别行政决策者与公众两类不同当事人的不同视角,使问卷内容更有针对性,本函忽略考试内部测量方面(如怎么出考卷)的问题,着重问升学考试与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功能匹配、行政权力划分等方面的关系问题。大致可分五个主题领域:1. 事到如今,到底是在制度上大改,还是修修补补小改? 2. 上海作为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是否可以在高教规模、学制、普职比等关节点上有大的突破? 3. 上海已获得了高考自主命题权,是否还可以向中央要地方立法、教育特区的权? 4. 是否可以实行真正的考生社会化、考试机构社会化(有时是市场化的含义)? 5. 终身教育与能力证书考试的关系。显然,这五方面的问题是“知情者”当局的问题,它既考验了领导的改革决心,也提供了系统背景的思考材料。

征询函原称《中国 100 官员征询》,在被征询者的分布上,本调查是按照“国家教育部—上海地方官员”、“党政首脑—主管教育的行政部门”这样两个变元来进行抽样的。国家教育部选取:教育部正副部长(包括主管教育的副总理),教育部有关司的司长,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及专家。上海市选取:市委、市政府、市政协正职领导,市教委正副主任,二十个区(县)的区(县)长与主管教育的副区(县)长,区(县)